

# 施永兴:历时14年,为“临终关怀”出版词典

14年前,65岁的施永兴想为临终关怀编一部词典。最近,这本书在京发布。

## 临终关怀起源于英国

1967年,集护士、社工、医师为一身的西赛莉·桑德斯女士在伦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院,以照顾癌症垂危患者。

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发端于1980年代。施永兴当时任职于上海闸北区卫生局医政科,后执掌上海闸北区红十字会老年医院,负责上海市卫生局医学领先研究项目——老年护理医院安息护理的模式研究,就此与临终关怀事业结缘,之后在社区临终关怀领域开展理论研究,建立临终关怀病区,探索形成本土化社区临终关怀体系网络与运作机制,并最终提出了上海的临终关怀模式。

## 临终关怀是渡人渡己

从1990年代初接触临终关怀起,施永兴从未脱离过临终关怀的临床工作,至今还在上海16个区中的13个区22家医疗机构,定期进行临终关怀的人文查房。

他对临终关怀理解深刻。他经常强调临终关怀是渡人渡己,也经常谈到,医护人员不仅要有治病救人的本事,更要有送人的艺术。他还是临终关怀的研究者。30多年出版临终关怀领域著作23部。



他说,专业书、教科书和词典,是医务人员著书追求的三大目标。临终关怀的书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科普书,向社会公众宣传临终关怀、生死教育。在这一领域,他出版了《老年人临终关怀》、《让生命享受最后一缕阳光:临终关怀百题》、《人生终站的陪伴:临终关怀百题》……第二种是专著,他和王光荣主编的《中国城市临终关怀服务现状与政策研究》,来自国家卫生部一项调研课题,在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创始理事长李家熙和秘书长罗冀兰领导下完成专著任务,影响较大。第三种是教科书。2015年,他主编了《临终关怀学概论》,该书前后印刷3次,作为临终关怀岗位执业资格培训教材受到社会关注。2023年再版。

## 他发愿要编一部词典

他说,为临终关怀编一部词典,就是做慈善事业。

14年前,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患有不可治愈疾病的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中国临终关怀事业进入卫生体系,开始全面发展。而中国临

终关怀的法律、政策、制度、专科设置等诸多问题,都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很好的诠释,甚至许多基本概念仍然没有清晰的定义。临终关怀学战略地位的提升要求临终关怀学术研究,编纂一部临终关怀学的词典,为教学、科研、知识普及、学术交流提供简明实用的工具。

2011年5月,施永兴开始酝酿和构思一部囊括临终关怀领域相关知识的专科词典,最初书名为《临终关怀学百科辞典》。

从业多年,他积累了大量临终关怀查房笔记、文献资料、书籍杂志、卡片资料等。这些远远不够,他广泛收集古今中外临终关怀相关领域的术语、名词、学说、学派、人物、期刊、论文、会议等方面资料,后期陈琦等同道加入进来协助整理资料,他们陆续检索论文2500余篇,参考教科书和专著380余部,建立资料卡片约400万字,初入选词条42个大类,5600余条。

2019年底,书稿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社又历时近五年,邀请二三十位专家,七审七校。终于,2024年6月29日,中国首部《临终关怀学词典》在京发布。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珉云在贺信中称,《临终关怀学词典》是我国临终关怀领域的第一部辞书,具有专业性、实用性、结构完整、知识新颖等特点。

谢海涛

# 一个爱“说话”的普通市民,走了

韩志鹏总是风风火火地出现在媒体镜头里:2011年,广州召开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他通过两个渠道报名都没选上,于是带着塑料板凳出现在会场,希望有个旁听的席位,他对听证结果不满意,“听证会不是听涨会”。

他再次走访了出租车司机、行业协会,去物价部门提交建议书,要求重开听证会。“不是不能调整物价,程序要公开透明,接受监督。”他对媒体说。

韩志鹏曾经做过工人、记者、编辑,在连续三届担任广州市政协委员时,是许多老百姓的“嘴替”、一些人眼里的“刺头”,但他最喜欢别人称呼他“板凳叔”,“我本来就是普通市民”。

《羊城晚报》退休记者王普,认识韩志鹏30多年了。他对记者说,韩志鹏观察社会比较精准,反映的问题都是老百姓关心的、急需解决的,而且韩志鹏的初心是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媒体喜欢他,老百姓听他说话也过瘾”。

一位记者跟着韩志鹏跑政府部门,曾经有过不解,为什么他要盯紧出租车调价的事?但调查了一圈,发现韩志鹏和各方利益都没有关系,“他没有私心”。

这位出生、成长在广州的“普通市民”,隔三差五会出现在电视屏幕里,用粤语评论当天的时事。他最后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里,是2023年11月7日。那一天,他依旧戴着鸭舌帽,畅谈如何规范电动车上路的问题,聊了两分半钟,语速比以往慢,脸色看着也不太好。但他依然保持着时事评论员的风格:案例多、善用俚语、发出民众的声音。

“他的责任心很强。”王则楚曾和韩志鹏同为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江频道《珠江新闻》栏目的时事评论员。他回忆,每次做时评节目,韩志鹏会查很多资料,有时会抱怨时间不够用,没来得及把数据、案例讲清楚。

韩志鹏住在同德国。那是广州一个解困区,大量老城区拆迁户被安置于此,有30万人。2013年之前,同德国没有公共厕所、公立医院、公立中学,进入中心城区只有一条双向四车道。韩志鹏认真调研后,写了一份有关同德国综合整治的提案。时任市领导看完后,立马约韩志鹏一起去现场,并表示:“同德国的整治要全民参



与。”后来,同德国成立了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咨委”),韩志鹏被推举为主任。那是广州首次在专项工程中成立专门的社会监督机构。

公咨委第一次在同德国的广场上摆摊接受问询时,街坊们涌向广场,整整提了1000多条整治意见,涉及新建高架桥、医院、学校、公园、地铁等。韩志鹏和公咨委的同事把意见整理后,提交给广州市政府,供决策参考。

韩志鹏的家庭住址,在同德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街坊遇到问题直接去家里找他。

在同德国高架桥竣工当天,他和同德国的居民一起走在桥上,高声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

后来,同德国公咨委的经验在广州其他社区广泛复制,成立了广州公咨委制度。韩志鹏还因此受邀去国家行政学院介绍如何做群众工作,做政府和市民的桥梁。

他还管过很多小事:白云山限行、珠江新城开通穿梭巴士、反对取消粤语台、推行垃圾分类……在听证会上,他为广州的水费、电费、出租车收费,发出消费者的声音。王则楚说,韩志鹏善于贴近群众,倾听民声。

第十二届广州市人大代表朱永平曾经和韩志鹏以听证代表的身份参与水价听证会,他回忆,韩志鹏提前走访过很多街坊,提出的建议讲数据、摆理由,具体细致到水价要调整至什么幅度。

“韩志鹏认真履职,有声有色担当社会责任,让群众对他留下印象。”广东省政协第十一届、十二届常委孟浩说,“老百姓记住他,是因为他盯准了民生缺口,大胆说出来,为政府决策拾遗补缺。”

韩志鹏曾说过,他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底气和坚持来自毫无私心。

2024年7月18日,69岁的韩志鹏逝世。他生前叮嘱家人,要低调办身后事。同德国街坊对他最多的评价是,“他是个好人”。魏晞

## 守护“净土”家园 他们在高原捡垃圾

远处高原的雪山巍峨壮丽,脚下垃圾遍地。这曾是109国道沿线观景台附近的真实面貌。2018年,河南小伙武相宏沿109国道骑行入藏,看到了高原上的垃圾问题和正在高原捡垃圾的人,萌生了重回这条国道捡垃圾的念头。

2020年8月,武相宏在109国道可可西里段青海格尔木和唐古拉山镇之间折返了一次,历时40多天,捡拾了1吨多垃圾,其中仅塑料瓶就有8000多只。这些垃圾装满了近300只容量为60升左右的蛇皮袋。他的故事连带高原的垃圾问题登上了微博热搜。

今年6月29日,武相宏又到了格尔木。这次,他特意多准备了3000个可降解塑料袋想分发给游客。可是到了109国道他才发现,以前随处可见的垃圾堆不见了,只能零星看到一些包装袋,不少游客自备

垃圾袋,不让垃圾落地高原。

这是一个美丽的改变。改变的背后,不只是高原上垃圾的量变,更是人们对生态保护理念的质变。个体的行为看似微小也效果有限,但只要开始,影响就会发生。

1994年,环保卫士索南达杰因保护藏羚羊不被盗猎而牺牲。当时,在长江源从事探险考察的杨欣听闻索南达杰的英雄事迹后赶到他的灵堂拜祭。受索南达杰影响,杨欣在3年后建立了可可西里第一个自然保护站,走上一条公益路。在多方努力下,盗猎藏羚羊的枪声停了。冰山退缩、水源地被污染等高原生态问题被提上新议程。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高原垃圾不断产生而当地无力妥善处理。

随着经济发展,垃圾问题更加严重了。一方面,途经109国道的自驾游游客多了,

往来青藏的货车多了。另一方面,人们产生的垃圾中,难降解的塑料越来越多。处置垃圾,刻不容缓。

由政府主导、民间力量辅助的形式逐渐运转起来。青海当地政府部门增派了负责109国道环卫工作的生态管护员。大约在2015年,格尔木人王兴香成为生态管护班的一员,负责109国道格尔木一昆仑山口路段的环卫工作。相比于肉体上的辛苦,心理上的煎熬更让人崩溃。一次,有游客在王兴香刚捡拾过的路面随手丢弃垃圾,被王兴香阻止。工作数年后,王兴香感到,109国道变得干净不少。

当地政府正在109国道沿线筹建更多的垃圾回收站,分散运输压力,降本增效。“环保是一条射线,有起点,没有终点。”杨欣淡淡地说了一句。

郑子愚